

冷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

倪世雄 潘忠岐

最近几年,围绕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原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反思,并通过将第三次论战进一步引向深入,为理解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现实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思路 and 模式。如“软权力”概念、“地缘经济学”、“两枝世界政治理论”、“新国际冲突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世界秩序理论”等,就是其中最集中的反映。总结和归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后冷战时代的最新发展,无论对于促进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进一步繁荣,还是对于指导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软权力”与“国家的退却”:

权力理论的延续

权力理论一直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核心。冷战结束前后国际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更是给权力理论注入了新的内容。在冷战后权力理论的新探索中,最突出的要推奈的“软权力”概念和斯特兰的“国家退却”思想。

奈认为,在信息时代,“知识就是权力”^①。谁能领导信息革命,拥有“信息权力”优势,谁就能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占居领导地位。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信息的全球化,传统的权力结构开始发生变革。“软权力的新形式正在出现,特别是在文化、教育、大众媒介

等方面,软权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的”^②。在奈看来,“软权力”是一种“合作型”的权力,而“硬权力”是一种“对抗型”的权力。“软权力”是一国使别国“想其所想”的能力,而“硬权力”则是一国使别国“做其所想”的能力。他认为,“软权力”的源泉主要有二:一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二是国际机制的规则与制度。因而,所谓“软权力”也就是一国通过自身的吸引力而不是强制力在国际事务中实现预想目标的能力。奈认为,在后冷战时代,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使用自己的“软权力”资源塑造国际形势,来影响他国的优先决策和利益界定。

奈的“软权力”概念得到了大多数学者和政客的认同。美国里根政府时期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利斯顿撰文指出,我们正置身其中的信息技术革命,破坏了社会和政治的平衡,使国家主权、世界经济和军事战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在经济、政治和外交领域巧妙地收集、处理并应用信息这一知识资本,将成为国家生存与繁荣,以及制度变迁的关键”^③。

至于信息革命给国家带来的影响,美国知名的政治学教授斯特兰认为,全球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国家的权威,“使权力实现了从国家到公司的转移”。其中,“国家权威受损最严重的领域是:防御、财政和福利”^④。在安全方面,全球化已使国家对外敌人入侵的防御不再必要,因为再也没有国家会为了占领他国领土而发动侵略战争。“在全球

化时代,只有三种例外的因素才会引诱邻国图谋开战:占领石油或天然气产地、控制水资源、收复领土或实现民族统一”。在财政方面,全球化使国家对于维持本国货币成为可靠的汇兑手段、结算单位和价值储备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而这些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福利方面,由于全球化为跨国公司和个体单位打开了避税的大门,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不良影响,从而导致福利性服务的锐减。他说:“在过去所有国家为市场当家的地方,现在市场都成了国家的主人。”^⑤

与斯特兰的“国家退却”思想非常接近的是马修斯的“权力转移”思想。马修斯认为,传统的国家权力正在发生转移,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开创的主权国家大权独揽的局面已一去不复返,“国际关系的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跨国公司等,正在与国家政府一起分享主权,过问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事务”。“国家权力向上、向下、向旁边,发生着由国家到超国家、次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的转移”^⑥。

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学者探讨过权力的转移问题,如奥根斯基和奈^⑦,但是他们研究的是权力在不同国家行为者之间的分配变化,并将其根源归结为不同国家“硬权力”和“软权力”的兴衰对比。与此不同,斯特兰和马修斯等人探究的不是权力在不同国家行为者之间的转移,而是权力从国家行为者向非国家行为者的转移。她们将这种权力转移的根源归结为组织机构的变化,即从等级到网络,从中央强制到自愿联合的变化。该变迁的动力乃是信息技术革命。急剧扩张的通讯能力在削弱传统权威的同时,大大提高了个人和集团的权力。

在一定意义上,“国家的退却”、“权力的转移”和“软权力”一样,也是对传统权力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但是,对斯特兰“国家后退”和马修斯“权力转移”思想提出质疑的也不乏其人。凯勒和保利指出:“权力……或许在不同

的社会内的确发生了转移,但是并没有很明显地转移到某些超国家团体。市场,或者更确切地说,巨大的无所不在的商业统治集团,并没有取代国家而成为世界的有效政府。”^⑧《经济学家》杂志刊文认为,“全球化不能决定国家的前途,全球化并不构成对国家权力的侵犯,因为那些权力本来未必属于国家。”^⑨。

得雷纳通过从全球化的角度批判欧莫的“国家终结观”,强调:“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权威的消解,相反,它只是反映了国家战略的变革和国力指向的重新定位。”他还借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发出号召:“世界全球化者,联合起来!”^⑩斯劳特也认为:“第一,个人权力尚不能取代国家权力。消费者对跨国公司破坏雨林和雇佣童工的联合制裁或许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大多数环境主义者和劳工积极分子更情愿通过国家立法来管理对外国子公司的控制。第二,权力转移不是一个零和游戏。非国家行为者权力的获益并不必然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相应丧失。”^⑪

杜鲁克的观点似乎比较折衷,“无论如何,民族国家都能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背景下存在下去。但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确实使民族国家发生了极大的变革,特别是它改变了国家的国内财政和金融政策、对外经济政策、对国际商业的控制,以及国家的战争行为。”^⑫

“地缘经济学”与“网络化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深入

“地缘经济学”,有人又称之为“经济/生态政治学”(“ecopolitics”中的“eco”正好取“economy”(经济)和“ecology”(生态)的前三个字母),是根据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新变化,依托国际政治经济学而产生的一种国际关系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地缘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卢特瓦克教授。

卢特瓦克认为,①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国际关系已从地缘政治学转向地缘经济学。在冷战后时代,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威胁已从全球军事危险转为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国际关系中“低级政治”(经济、生态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显超过“高级政治”(军事对抗、核威慑)。②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转向地缘经济学,使原有的冷战机制和体制不再适用,国际社会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改革国际经济体制,调整国际经济关系,以适应冷战后地缘经济发展的需要。③冷战结束带来“安全”概念内涵的扩大。地缘经济学认为,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有政治和军事,更重要的还有经济和生态环境。在冷战后时代,由于“发展”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突出和活跃的主题,因而与“发展”密切相关的环境安全问题,自然也就更广泛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保护全球生态环境,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将是下个世纪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④地缘经济学主张以影响促变化,即以经济和生态的优势控制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变化取向。在某种意义上,谁掌握了国际经济和生态的优势,谁就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较大发言权^⑬。

“地缘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认为世界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①日本率领的环太平洋经济区,包括韩国、东南亚和可能的中国;②美国领导的西半球经济区,基础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今后将包括拉丁美洲在内;③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将逐渐覆盖前苏联和东欧,也许还有北部非洲。该模式的倡导者除了卢特瓦克,还有曼德、加登和塞罗^⑭等。其中,塞罗强调:“在未来的竞赛中,三个经济霸权中的每一个都倾向于超过其他两者。无论哪一个实现了这种超越,都会位居领先,都会象英国主导19世纪,美国主导20世纪那样,主导21世纪。”^⑮他们认为,三大集团谁能获得较大优势,主要取决于各个集团的规模、地理位置、

人口、文化、政治手腕等因素。根据这些因素,曼德和塞罗确信,美国领导的集团到头来可能是最弱小的,最强大的则是欧洲集团,日本领导的东北亚集团居中。

然而,地缘经济学的这一个观点却遭到了不少批评。哈克维认为,“三大经济区”模式忽视了世界上“相互依存的全球化、工业发展的多国化、投资、生产和市场流动的自由化等趋势”;“它过于以国家为中心,过于把贸易看作是国家之间的,而不是全球复合背景下公司之间的行为”;他们还低估了所谓地区集团中国家间的“政治断裂带”^⑯。奈也对地缘经济学提出了批判。他认为:①三个经济集团模式与全球的技术发展趋势南辕北辙;②严格的地区集团与少数国家需要通过全球体系保护自己免遭邻国蹂躏的国家利益相背离;③地缘经济学没有考虑到安全因素,如日本和德国仍然需要美国的“安全保护伞”^⑰。

此外,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诺教授几年前出版了一本著作:《美国衰退的神话》。该书被霍夫曼誉为继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后唯一一部关于全球经济/生态政治学的力作。书中,诺指出,美国经济实力虽有所削弱,但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力、竞争力和控制力仍为最强,若以美国实力衰退为由,放弃对全球政治、经济和自由贸易的领导权,那将犯下灾难性的错误。他强调,美国应充分运用自身经济实力,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其成果不仅与西方国家,而且可以与发展中国家分享,但主动权应掌握在美国手里^⑱。

与强调“三大经济集团”的“地缘经济学”不同,一些学者和政客更注重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伯顿认为,未来的世界经济将是一种“网络化经济”。电子计算机和通讯技术正在共同开创电子市场,而电子市场完全有赖于强大的信息网络。他说:“国际互联网就是世界聚合的具体表现”,“电子商业不会摧毁传统的物理商品市场,而是将与其共存并逐渐使其转型。同样,在国际关系领域,网络化世

界不会取代民族国家,但却与民族国家一起存在,并对民族国家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①9}

另外,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科布林教授也认为,随着信息的全球化,“电子货币”的出现,传统的国家市场开始终结,传统的地理空间失去了意义,电子商业实际上已经消除了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国界,因而,未来的世界经济将是“电子网络化的全球经济”、“电子一体化的世界经济”^{②0}。

伯顿认为,信息革命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手工业和服务业,我们即将经历的则是创造完全新型的电子市场。在他看来,未来的网络化经济将是全球性的、异质性的、非中心的、开放的和安全的,网络化经济对市场极端敏感,能够提供丰富的选择机会,并突出软设备的重要价值,但却不能积极创收。据此,伯顿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美国更快地走向网络化经济。美国拥有强劲的计算机硬件工业,居世界领先地位的软件工业,迅速放松管制的通讯工业和强烈的消费需求,因而美国将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相比,日本居其次,欧洲则落在后面。

“两枝世界”与“地球村”： “全球化理论”的出现

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浪潮。一时间,全球化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它同样也引起了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的极大兴趣。最近几年《外交》、《外交政策》、《国际组织》、《国际安全》、《华盛顿季刊》、《经济学家》等权威杂志连篇累牍地刊载有关全球化的文章,1997年美国《当代历史》杂志更是开辟专刊研讨全球化问题。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在最新出现的全球化理论中,最富盛名的要属罗斯诺的“两枝世界”政治理论,和巴尼特与卡瓦纳夫的“地球村”模式。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罗斯诺教授认为,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进入了一个充满动荡和变革的时代,全球化与地区化、一体化与分散化、继承与变革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三种基本矛盾。他强调,自二次大战以来,世界政治经历了从“两极”到“两枝”的演变。冷战后的世界政治出现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体系”与“多中心国际体系”相结合的“两枝”格局^{②1}。但是两者并非平分秋色,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体系”在世界政治中的支配地位开始削弱,而强调全球相互依存的“多中心国际体系”的地位却日益突显。正如罗斯诺自己所言,他的“两枝世界政治模式”是以全球政治为重心的。因此,罗斯诺又着重对全球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罗斯诺认为,“全球化是改变人类对地域的成见和对国际体系的传统管理的某种事物”。它既不是事物存在的普遍条件,也不是事物发展的理想的终极状态,而是一种直接指向变革的过程^{②2}。罗斯诺强调,全球化过程充满了矛盾和复杂性。其中,全球化与地方化就是一对最主要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全球化不断破除边界,而地方化却不断增加边界”。罗斯诺认为,“全球化的过程是通过四条相互联系、相互重叠的途径实现的:受益于最新通讯技术的双向对话式互动;借助于大众传媒的单向独白式通讯;行为、习惯和技艺等方面的效仿;制度惯例的同化与同构。”^{②3}

此外,罗斯诺还用全球化的动力学来解释冷战后的世界安全问题,提出“安全全球化”的概念。他说:“削减防务预算、强调信息战争、青年人抵制军事征兵、国家安全考虑重新突出经济繁荣和个人富裕问题等等,已成为世界上普遍性的大趋势。这种现象可以用安全的全球化加以解释。”^{②4}

毫无疑问,在全球化背景下,信息革命的

发展使各国都极其重视对“信息战”的研究，以图在未来的战争中占据一定的优势。奈和欧文斯曾专门撰文探讨美国的信息优势。他们认为，信息革命的主要领导国将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强大。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国家就是美国。收集、整理、发送信息的能力优势将有助于美国以较低的代价挫败传统的军事威胁。“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信息将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商品，恰如在以潜在的大国冲突为背景的国际体系中，武力威胁与使用被看作是主要的权力资源一样”^{②5}。

里斯顿也认为，在军事领域和在平民生活领域一样，信息正以各种形式取代原有的“硬设备”。他把军事智能重新更名为“信息统治”，并认为信息将在未来的战争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②6}。伯顿提出，信息的全球化“使安全概念的界定不再取决于可用武器的数量和能够快速部署到位的部队规模，而是取决于能否获取关键信息的能力”^{②7}。但是，里斯顿还指出，完全依赖信息技术也有危险的一面。因为“流氓国家或集团即使不能通过指挥庞大的军事力量发动战争，但却可以借助信息手段轻而易举地点燃战争导火线”。如果从这个角度分析，那么“美国对庞大信息网络的日益依赖或许会使美国变得更加脆弱而不是更加强大”。

就平民生活领域而言，全球化的新浪潮再一次唤起了人类“地球村”的梦想。巴尼特和卡瓦纳夫就是两个主要的编梦人。他们认为，高新技术的日新月异，传真机、国际互连网、信息高速公路、电子信箱和通讯卫星等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把全世界各地区、各国家紧紧地联在了一起，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国际贸易、经济投资的相互依赖，文化、政治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使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接触与了解日益加深。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如人口爆炸、环境污染、水源短缺、温室效应、难民流动、以及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等，

需要全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才能解决。所有这些全球化的特征都在加速地球村的形成。他们指出：“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政治的根本冲突将不是国家之间，甚至不是贸易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全球化的促动者与地方化的维护者之间的冲突。”^{②8}

里斯顿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全球化正在使我们走进一个全球社区，不管我们是否有此准备”。“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穷人和富人、北方和南方、东方和西方、城市和乡村，于同一时间在全球电子网络中共同分享同样的信息，彼此紧密相连。”^{②9}

然而，仍然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例如，莫伊雷就将“全球村”斥为“乌托邦”。他说，国际互联网以及信息全球化尽管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它决不是“全球村”梦想变成现实的象征，“信息全球村依然只是个神话”^{③0}。

“新国际冲突论”：国际安全研究的发展

作为国际政治理论的一个分支领域，国际安全研究(ISS)着重探究国际社会生存、稳定和发展的客观环境与保障机制。战后，国际安全研究经历了若干阶段：(1)50年代至60年代的形成期。国际安全研究所依托的背景是冷战时代的两极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研究的重点是军事战略和核威慑理论。(2)70年代的发展期。1973年石油危机后，国际安全与经济相互依存趋于结合。由于美国对越战的反思，使国内问题开始渗入国际安全研究。在这一阶段，国际安全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3)80年代以后的变化期。一方面，国际安全研究的内容得到拓展，出现政治、军事、经济综合分析与研究，诸多全球问题(环境、移民、债务、核军备控制、国际恐怖等)也给国际安全研究注入了新内容；另一方面，国际安全研究的队伍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扩大，不仅历史学家、战略理论家，而且政治学家、经济

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者也加入到国际安全研究的行列^④。

在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变过程中,战后早期曾有过四个“国际安全传统理论”:威慑理论、裁军理论、军备控制理论和有限战争理论^⑤。如约瑟夫·奈所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始终存在“国际安全研究理论化的传统”,而且“从长远来看,安全战略与政策必须建立在安全理论的研究基础上”^⑥。

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安全研究逐渐向深度和广度推进,新的国际安全观相继出现。其中,“新国际冲突论”特别引人注目。

1996年,约瑟夫·奈在《理解国际冲突》(1993年)一书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论文“冷战后的冲突问题”。差不多同时,戴维·鲍德温也发表了一篇重头文章“安全研究与冷战的结束”。奈和鲍德温在文章中勾勒出“新国际冲突论”的初步构架:(1)从国际安全角度来看,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一个“不确定过寂时期”。其原因:一是已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决定性的军事对抗;二是大国实力、科技、经济和文化的变化加速了;三是未来冲突形式将非常不同于冷战时代的冲突形式。(2)冷战后的国际冲突主要有三种类型:大国冲突、地区冲突和内部冲突^⑦。首先,由于冷战结束后合作重于遏制、对话代替对抗的趋势得到发展,大国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但还不能说已完全消除,大国之间的误解、分歧和安全困境等冲突的导因仍然存在。其次,象海湾战争那样的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反而比较大了。地区冲突往往带有均势的性质,一旦发生,就会产生广泛持久的地区或全球影响。再次,内部冲突,又称种族/民族冲突(communal conflicts),常常发生在国家内部,非洲、前苏联和巴尔干地区尤甚,大多是由种族矛盾、宗教纷争和边境摩擦所致。从冷战结束到1996年,发生的30多次重大冲突几乎都是属于这一类型。它发生的地点是局部的,但影响却是地区性或全球性的^⑧。所

以,冷战后国际冲突的主要表现就是地区和内部冲突。(3)奈等人认为,面临这一变化,美国的领导作用至关重要。无论用“硬权力”(经济和军事实力)还是“软权力”(政治制度和文化影响)来衡量,美国都是最强大的国家,有责任防止或减少大国冲突、地区冲突和内部冲突。然而,冷战后美国面临着两难境地:它强大,但并没有强大到单干就能实现自身的安全目标,美国不应卷入每一个正在发生的或潜在的冲突,美国应继续运用国际结盟或伙伴关系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安全利益,因为冷战后国家的最高目标是“安全”^⑨。不难看出,美国对“新国际安全论”的政策解析便是“领导地位+结盟伙伴”。

从理论层面来看,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国际安全问题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1)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冲突与无政府状态有关,与安全困境的结果有关;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国际冲突不仅取决于均势的变化,而且还取决于国内政治结构、价值和文化的冲突双方或多方的影响。(2)新现实主义强调,权力转移、均势失衡、争夺盟国、控制资源均是导致冲突的诱因;新自由主义则强调,经贸关系极其重要,经济相互依存越加强,就越能防止国际上或国家间发生冲突或战争。因此,新现实主义认为冲突大于合作,新自由主义则相反,认为合作大于冲突。(3)新自由主义强调,有效的国际体制和机制有助于防止国际冲突;新现实主义并不反对这一看法,但是它认为,在实践中,体制和机制只有在不必要时才有效,无效时才成为必要(These institutions are effective only when they are not needed, and needed only when they are not effective.)^⑩。奈和鲍德温等人都指出,仅仅一种观点,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均不足以理解和把握冷战后的国际冲突,人们必须学会同时运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与方法。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罗伯特·杰维斯的“理性威慑理论”(RDT)。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杰维斯一直潜心研究这一理论,并发表了大量有关国际冲突的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战争与误解”(1988年)、“现实主义、博弈理论和合作”(1988年)、“关于威慑的辩论”(1988年)、“理性威慑:理论与实证”(1989年)、“汉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的科学研究”(1994年)、“冷战的遗产”(1995年)等。杰维斯认为,旧时的威慑理论偏重军事手段,而理性威慑理论则将“格局、策略、心理”等因素和理性选择结合起来,为国际安全设计出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架构,把国际安全升格到一个新的理论分析层面。理性威慑理论如今已成为冷战后国际冲突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民主和平论”:一个古老“神话”的泛起

民主和平的理论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早在18世纪末,西方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在批判绝对主义权力的同时,就提出基于道德要求和民主法制的“永久和平”思想。这一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学派,尤其是威尔逊理想主义的“使国家和世界民主化”的主张。在以后现实主义占支配地位的半个世纪里,民主和平思想,虽被压抑,但未消沉。80年代初,“民主和平论”再次跻身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行列,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开始在国际关系领域再次受到关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自由民主的理念和制度终于得到人民的赞许,历史的目标宣告完成。”^⑧塞缪尔·亨廷顿则称之为“20世纪末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⑨。于是,一个古老的“神话”重新泛起。

反映“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论著有:米切尔·多伊奇的“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事务”(1983年)和“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1986年)、罗伯特·罗特伯格和西奥·多兰

布合著的《主要战争的根源与防止》(1989年)、内勒·戴尔蒙德的“促进民主”(1991年)、塞缪尔·亨廷顿的《20世纪末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1991年)、约瑟夫·马拉奇科的“输出民主:完成美国的天赋使命”(1992年)、布鲁斯·鲁塞特的《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1993年)和“民主和平可以建立吗?”(1993年)、艾都·欧伦的“民主和平的主观性”(1995年)和爱德华·曼斯菲尔德的“民主化和战争”(1995年)等。

民主和平论的中心论点是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或从不)相互开战。为证明这一论点,该理论列举了大量历史事实,并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在民主国家之间如同在其他政体之间一样存在着许多利益冲突。但是,民主国家认为战争不是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合适方法;第二,尽管自由民主国家很少或从不相互开战,但他们可能和非民主国家开战。

民主和平论提出的三个主要概念是:民主和平、民主政治和国际政治系统。它认为,单位层次上的民主政治结构与民主和平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民主和平论把这种因果逻辑归结为民主国家存在着政体上的两个根本限制因素,一是把民主国家间无战事归因于机制上的限制,即公共舆论或国内政治机构的监督与平衡对政府决策的制约作用;二是民主标准和文化因素,即民主国家之间有着相互尊重、合作与妥协的共同特点。

以上两种模式或两种限制因素是民主和平论与主张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根本区别。归结起来,两者对国内政治结构和国际政治系统的关系认识不同。民主和平论认为,基于国内政治机构对于一国对外行为的重要性,要达到国际政治的和平状态,就要先从国家的“民主化”着手。现实主义则认为,即使一个国家内部发生变化,国际政治体系的无序状态也是不会改变的,系统结构是国际政治结果的主要决定因素。

随着冷战的结束,民主和平的呼声甚嚣

尘上,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冷战的胜利是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民主和平论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开始结合,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理论支柱,这也是民主和平论倍受西方政治家青睐的原因之一。

早在1983年多伊奇提出建立“民主和平区”的设想时,没有受到多大的注意和支持,那篇创新之作只不过发表在美国一个不起眼的杂志上。但是,不到十年,他的民主和平论就得到了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重视,一些评论家迫不及待地提出,向外输出和促进自由民主思想应当成为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的情况下,美国的学术界和政界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在冷战后没有任何一种“敌对意识形态”敢于向“自由民主制度”提出挑战。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帕特里克等人认为,“冷战结束后,民主资本主义已占上风,并在全球范围得到发展。”^⑩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自由民主制度是民主和平的前提和可靠保证。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推行自由民主制度将意味着世界“永久和平”的到来。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对外“扩展战略”正是基于“民主国家间无战事”和“市场经济可以推动民主化”两种观点而制定的。民主和平论因而成了其制定对外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民主和平论与美国推行霸权的关系不言而喻。

“文明冲突论”:世界冲突理论的争辩

最近,“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哈佛大学著名教授亨廷顿,又出版了一本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对他的“文明冲突观”进行了更全面、更深入、更详尽的阐述,从而在学术界再一次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亨廷顿而起的这场关于“文明冲突”问题的争辩,涉及的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堪与坎南的“遏制论”相提并论,称得上“世纪之辩”。

亨廷顿在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后冷战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政治成了多极和多文明的政治。”^⑪亨廷顿之所以把冷战后的世界看作是多极和多文明的,就在于他认为:①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的政治忠诚指向发生了从国家到文明的深刻变换。他说:“在后冷战世界,不同人民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意识形态、政治或经济,而在于文化。”^⑫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正在转向对更大的文化实体,即“文明”的认同和忠诚。②冷战后,文明之间的冲突大大多于文明内部的冲突。他说,认同和忠诚方面的这种变换将极大地减少同一文明内部的冲突,同时加剧文明之间的“安全困境”。冷战后,“最普遍、最重要、最危险的冲突,将不再是社会阶级之间、贫富之间或经济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归属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⑬。

亨廷顿指出,冷战的结束是国家对抗的旧世界与文明冲突的新世界之间最重要的历史分界线。虽然国家仍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者,但它们越来越根据文明界定自身利益。结果,国家经常与那些具有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进行合作或相互结盟,而与那些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由此,亨廷顿认为,在这个新世界上,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正让位于文明之间的冲突;地区政治是种族政治,而全球政治则是文明政治^⑭。

既然“在当代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在取代两个冷战超级大国,成为吸引或排斥其他国家的首要支柱。……文明核心国既是文明内部又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是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的核心要素”^⑮,因此,“休止断裂带战争,阻止它们升级为全球战争,主要依靠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的利益和行动。断裂带战争自下而上,断裂带和平却只能自上而下”^⑯。

亨廷顿强调,全球文明间战争的避免,有赖于世界领袖接受并合作维持全球政治的多元文明性质。在未来时代,主要文明间战争的

防止需要各国遵守三个规则:①弃权规则,即核心国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这是多文明和多极世界的和平的首要前提条件;②合作调节规则,即核心国相互协商遏制和休止彼此文明间的断裂带战争;③求同规则,即所有文明的人民都应探寻并努力扩展与其他文明在价值观、惯例和习俗方面的共性^{①7}。总之,人类必须学会如何在复杂、多极和多文明的世界内共存。

亨廷顿不仅把文化和文明看作是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变量、国际事务中国家行为的重要基础,而且看作是国际冲突的首要原因。这是亨廷顿文明范式的核心和命脉所在。

尽管亨廷顿本人自称此书是“关于冷战后全球政治演变的重要解析”^{①8},但是,国际学术界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却是褒贬不一、见仁见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称亨廷顿“为理解下个世纪全球政治的现实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分析框架”。布热津斯基赞誉《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是一本理性的杰作,思想开阔、想象丰富、发人深省,它将使我们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发生革命性的变革”^{①9}。格雷斯认为,亨廷顿不是“只对武器、权力规则和战略联盟感兴趣的冷战之鹰”,而是“通过警戒普遍迷信中固有的危险,为人们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现实主义的冷战国际关系范式”^{②0}。美国民主基金会主席格什曼强调,“亨廷顿为证明自己无以伦比的恢宏视野,他将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分析结合为冷战后全球政治的综合理论。不论人们是否同意他所说的一切,谁都不能不被他的智力勇气和创造性打上深深的印记。”^{②1}

然而,更多的学者对亨廷顿的理论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奈指出:“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一个主要的冲突根源是宗派主义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认同感。此话不假,但他只抓住了认同感冲撞的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大文化内部的认同冲突要远远多于大文化之间的认同冲突。”^{②2}福勒认为:“因权力、财富、影响分配不

公以及大国不尊重小国引起的世界性冲突,大大超过基督教、儒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文化是表达冲突的载体而非原因。”^{②3}麦哲在透彻分析了亨廷顿的观点之后,得出结论:“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而不是文明。虽然文明差异确实助长、促成了许多讨厌的冲突,但它们与一些冲突并无必然的关联。”^{②4}沃尔特认为,“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引发战争,恰如文化相象并不能保障和谐一样”。“‘文明的冲突’提供的是一个危险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越是相信它,把它作为行动的基础,它就越有可能变为现实。”^{②5}此外,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艾肯伯利、美国塔夫兹大学政治系主任史密斯、英国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豪厄尔、美国《商业周刊》社论专栏编辑詹姆斯伯姆等人也撰文批判亨廷顿,认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一种“危险的猜测”,“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预言只是反映了冷战后外交范式的匮乏,而决不是新的坎南式的千年洞察。”^{②6}

“世界新秩序”研究:关于世界未来的展望

世界秩序理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自本世纪初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以来,世界秩序问题一直为国际政治学者所关注。冷战结束后,随着旧的世界秩序的瓦解,越来越多的学者,象基辛格、奈、亨廷顿、哈克维和斯劳特等,从事于探索和研究如何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并提出各种有关世界新秩序的不同模式。恰如基辛格所指出的,“世界秩序的内容、作用和目标的变化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迅猛和深刻,这样具有全球影响。”^{②7}

基辛格本人就曾对世界新秩序进行过深刻的思考。他认为:“世界新秩序……必须对下述三个问题提出答案: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是什么?它们互动的方式是什么?它们互动,以什么为目标?”^{②8}在展望世界的未来时,

基辛格指出：“21 世纪的国际秩序会出现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愈来愈分散；一方面又愈来愈全球化。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这个新秩序会更接近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较不象冷战时期严格划分的两大阵营。彼时至少或有六大强权：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可能再加印度，另有许多许多中小型国家；与此同时，国际关系已首次真正地全球化了”^{②③}。他强调，在这样的国际体系中，秩序只能象过去几个世纪那样建立在协调和平衡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

与此相似，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也提出了一种多极均势的世界秩序模式。但与基辛格不同的是，它认为未来世界发展的主体模式是由四个强国之间的力量均衡构筑的，即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欧洲，或许还要加上日本和穆斯林两支力量^④。

奈对基辛格的历史类比进行了批判，并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世界秩序新论”。奈认为，世界秩序是国际关系结构变革的复杂过程，是大国之间权力稳定分配的结果。决定冷战后世界秩序走向的主要因素是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的交互作用，由此可能导致的世界秩序模式有：①回到两极世界（美国—俄罗斯）；②多极世界（美国、日本、西欧、俄罗斯、中国）；③三大经济集团（北美、西欧、东北亚）；④单极霸权（美国）；⑤单极指导下的多层次相互依存。奈认为，只有第五种才是最现实、最可行的世界秩序模式^⑤。

亨廷顿则另辟蹊径，通过将“文明冲突论”与世界秩序问题挂钩，提出以文明为基础重建面向 21 世纪的世界新秩序。他认为，冷战结束期间，人们提出的关于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地图或范式主要有以下四种：①一个世界：既快乐又和谐；②两个世界：我们与他们；③大约 184 个国家构成的世界；④极端混乱的无政府世界。由于作为地图的范式，对现实

世界的描绘必须既准确又简单，因此，比较而言，范式①和范式②过于简单化，而现实性不足；范式③和范式④则过于接近现实，而简单性不够。又由于这四种范式彼此之间互不相容，因而必须用一种新的范式，即文明范式取代它们^⑥。亨廷顿写道：“在即将到来的时代里，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才是防止世界战争的最可靠保证。”^⑦文明范式“为人们认识世界、区分主次、展望未来和指导决策，提供了一个既明晰又简单，既贴近现实又易于掌握的框架”^⑧。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阿克维最近从国际体系的角度对世界新秩序的不同模式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和概括。他认为，当今西方学术界至少存在七种关于世界新秩序的模式或范式。除了上面提到过的地缘经济学的三大经济集团模式、巴尼特和卡瓦纳夫的“地球村”模式、基辛格等人的多极均势模式、被奈批判过的单极霸权模式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模式，还有辛格和韦达夫斯基的“和平区”与“动乱区”并存模式，以及“新的两极模式”^⑨。

辛格和韦达夫斯基认为，现实的世界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和平、富裕、民主区域”，包括西欧、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大洋洲，占世界人口的 15%；另一部分是“动乱、战争、发展区域”，包括前苏联、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多数国家^⑩。“和平区”内的国家，由于彼此之间政治上的观念一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国际关系将不受相对军事力量的影响，即使出现磨擦和矛盾，也会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而不会诉诸武力或战争。相反，“动乱区”内的国家，由于政局不稳、经济落后、人口过多，国际关系将处于一种动荡、不安、混乱、甚至战争的状态，恰如卡普兰在“即将来临的无政府状态”^⑪中所描述的。

阿克维本人在概述了多极均势模式和单极霸权模式之后，认为仍不能排除未来世界回归两极模式的可能。其形式可能是美俄对

全,或美日、美中对抗,恰如亨廷顿、伯恩斯坦和芒罗^⑧等人所预言的。但是他认为,最可能出现的形式是中俄集团对美欧联盟,或全亚洲国家集团对美欧俄联盟^⑨。哈克维把这称作是“新的两极模式”。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斯劳特教授从全球化的角度,对世界新秩序进行了独特的分析。他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是无法替代的,“国家并不是正在消失,而是正在分裂成各自独立、功能不同的部分。这些部分——法院、管理机构、行政部门,甚至立法机关——正在与国外的相应部分结成网络,创建密集的关系网,从而构成一个新的跨政府秩序。”^⑩斯劳特指出,“跨政府主义作为一种世界秩序理念,比其他现存任何一种世界秩序理念都更有效和更具潜在的说服力。”^⑪在新世界中,网络化机构将发挥世界政府的功能——立法、施政和判决,而不带有世界政府的形式。政府网络超越了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传统分歧。因而,政府网络是信息时代的政府,它将为世界提供建构 21 世纪国际大厦的宏伟蓝图。

※ ※ ※ ※

综上所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最近几年获得了新的发展。西方国际关系学者不仅对原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而且通过论战取得了一些理论上的突破,并为下一步的理论深入挖掘了更大的可能空间。

究其根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繁荣,除了应归功于西方国际关系学者们的智慧与机敏之外,更主要的还在于时代的发展和世事的变换。恰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⑫作为时代理论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关系理论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1991 年 12 月苏联的解体标志着战后两极对抗、两权争霸的冷战时代最终结束,一个以多极化和新秩序为基本特点、以和平和发展为两大主题的冷战后时代随之开始。冷战的结束、时代的交替、全球化的新浪潮等都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自我反思、自我修正和自我发展,提供了最广阔的舞台和最肥沃的土壤。

我们相信,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定会有助于中国学者开阔思路、拓展视野,并进而通过借鉴和“拿来”,发展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以此为盼!

(作者:倪世雄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潘忠岐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注释:

- ① Joseph Nye and William Owens, “America’s Information Edg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6.
- ② Joseph Nye,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Fall 1990.
- ③ 利斯顿:“第三次技术革命”,日本《中央公论》1997 年 11 月号。
- ④ Susan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58.
- ⑤ Susan Strange, “The Erosion of the State”, *Current History*, November 1997.
- ⑥ Jessica Mathews, “Power Shif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1997.
- ⑦ 参阅: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68; Joseph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Joseph Nye,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Power”, *Dialogue*, No. 4, 1990; Joseph Nye,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Fall 1990;
- ⑧ William Keller and Louis Pauly,

- “Globalization at Bay”, *Current History*, November 1997.
- ⑨ “The Future of the State”,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20th 1997.
- ⑩ Daniel Drezner, “Globalizers of the World, Unit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1998.
- ⑪ Anne — Marie Slaughter, “The Real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7.
- ⑫ Peter Drucker,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e Nation — State”,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7.
- ⑬ Edward Luttwak,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eo — Economics”, from Armand Clesse, Richard Cooper and Yoshikazu Sakamoto ed. .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East—West Order*,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4, p. 220, p. 236.
- ⑭ Edward Luttwak, *The Endangered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3; Walter Mead, “On the Road to Ruin”, *Harper’s*, March 1990; Jeffrey Garten, *A Cold Peace*,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2; and Lester Thurow, *Head to Head: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 Morrow, 1992.
- ⑮ Lester Thurow, *Head to Head: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 Morrow, 1992, p. 246.
- ⑯ Robert Harkavy, “Images of the Coming International System”, *Orbis*, Fall 1997.
- ⑰ Joseph Nye, “What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Spring 1992.
- ⑱ Henry Nau, *The Myth of America’s Decline: Leading the World Economy into 1990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reface, p. viii — xiii.
- ⑲ Daniel Burton, “The Brave New Wired World”,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7.
- ⑳ Stephen Kobrin, “Electronic Cash and the End of National Markets”, *Foreign Policy*, Summer 1997.
- ㉑ James Rosenau, “Normative Challenges in a Turbulent World”,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 1992.
- ㉒ James Rosenau, “The Complexities and Contradictions of Globalization”, *Current History*, November 1997.
- ㉓ James Rosenau, “The Dynamics of Globalization: Toward an Operational Formulation”, *Security Dialogue*, Vol. 27 (3), 1996.
- ㉔ 同上。
- ㉕ 同注①。
- ㉖ Walter Wriston, “Bits, Bytes, and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7.
- ㉗ 同注②。
- ㉘ Richard Barnet and John Cavanagh, *Global Dream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 ㉙ 同注②。
- ㉚ Claude Moisy, “Myths of the Global Information Village”, *Foreign Policy*, Summer 1997.
- ㉛ Joseph Ny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from *American Defence Annual 1988—1989*, p. 231—232.
- ㉜ John Garnett, *Theories of Peace and Security*, p. 35.
- ㉝ 同注③, p. 238.
- ㉞ Joseph Nye, “Conflict after the Cold Wa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1996.
- ㉟ 同上。
- ㊱ 同上; David Baldwin,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orld Politics*, October 1995, p. 216.
- ㊲ 同注④, p. 7.
- ㊳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p. 11.
- ㊴ 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 Century, 1991.
- ⑩ Jeane Kirkpatrick, Jack Kemp, Lamar Alexander, Steve Fordes, and Donald Rumsfeld, "The Eagle and the Dragon",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3, 1997.
- ⑪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p. 21.
- ⑫ 同上。
- ⑬ 同注⑩, 第 28 页。
- ⑭ 同上。
- ⑮ 同注⑩, 第 155—157 页。
- ⑯ 同注⑩, 第 298 页。
- ⑰ 同注⑩, 第 316 页, 320 页。
- ⑱ 同注⑩, 第 14 页。
- ⑲ 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的评论分别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封面。
- ⑳ David Gress, "The Subtext of Huntington's 'Clash'", *Orbis*, Spring 1997.
- ㉑ C. Gersman, "Clash within Civilizations", *Journal of Democracy*, October 1997.
- ㉒ Joseph Nye, "Conflicts after the Cold Wa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1996.
- ㉓ Graham Fuller, "The Next Ideology",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5.
- ㉔ Michael Mazarr,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Review Essa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Fall 1994.
- ㉕ Stephen Walt, "Building up New Bogeymen",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7.
- ㉖ G. John Ikenberry etc., "The West Precious, Not Uniqu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7.
- ㉗ Henry Kissinger, "How to Achieve the New World Order", *Time*, March 14th 1994.
- ㉘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47 页。
- ㉙ 同上,第 7 页。
- ㉚ The New World Order: "Back to the Future", *The Economist*, January 8th, 1994.
- ㉛ Joseph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Harper Collins Collage Publishers, 1993, p. 190—192.
- ㉜ 同注⑩, 第 31—36 页。
- ㉝ 同注⑩, 第 321 页。
- ㉞ 同注⑩, 第 36 页。
- ㉟ 同注⑩。
- ㊱ Max Singer and Aaron Wildavsky, *The Real World Order*, Chatham, N. J.: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1993, p. 3.
- ㊲ Robert Kaplan, "The Coming Anarchy", *The Atlantic Monthly*, February 1994.
- ㊳ 参见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Knopf, 1997.
- ㊴ 同注⑩。
- ㊵ 同注⑩。
- ㊶ 同注⑩。
- ㊷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82 页。